



贸易的 未来

多边贸易体制已经病入膏肓，
政策在塑造未来体制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

佩妮洛皮·寇吉亚诺·哥德堡

在布雷顿森林多边机构成立 75 周年之际，多边主义的好处却受到挑战，这确实很讽刺。对当前贸易体制的作用的质疑甚嚣尘上。面对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贸易的未来会如何？近年来保护主义盛行，是否昭示着孕育了全球化的、基于规则的开放贸易体制将走向终结？或者，我们能够通过明智的改革挽救这一体制？

战后全球经济呈现史无前例的全球贸易和收入增长。对于这种增长的解释有很多：信息和通信成本急剧下降；技术变革有利于生产进一步分散化；政治动向，如东欧和东亚与全球市场整合；国际合作。但这个问题有个本质性的特点，即如果要上述每种解释对于贸易增长的相对贡献进行量化，就无法清晰识别，而且与可靠的计量经



济学证据相违背。然而，基于第一原则、有强烈提示意义的实证证据以及民间说法，很少有人质疑基于规则的、可预见的贸易体制对全球大多数地区的贸易及贸易催生的增长贡献巨大，尤其是在欧洲和东亚。遗憾的是，并非人人都参与了这一体制。有些国家落后了，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国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受益于贸易的国家，人们并没有公平地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但是，贸易仍然一直被视为推动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基于规则的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好处不仅仅是降低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满足要求的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可参与。规则可减少不确定性，鼓励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给予其所急需的投资。这有助于各个国家规范国内的保护主义游说。同时，能够让强大国家做出可靠承诺，不对弱小国家滥用议价能力，从而激励弱小国家参与贸易协商。在此背景下，发展中经济体对于近期的贸易紧张尤其担心，因为它们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这些国家是否还能够指望一个有效运行的多边贸易体制帮助它们与全球市场进行整合呢？

结构性因素

在担心贸易紧张的同时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即使是在当前的贸易紧张之前，这一势头也已非常明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贸易崩塌。2008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贸易一直没有恢复之前的势头。已经有人对此给出了多种解释——周期性因素，如需求疲软，尤其是对耐用品与投资品需求疲软，这些产品对于贸易的敏感性更高；企业投资水平低；金融危机后贸易融资受限。但是，两种主流说法给出的原因具有结构性的特点，因此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它们指向的是可能更加难以克服的长期因素：(1)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中国国内增加值的相应增加；(2) 相信生产分

散化已结束，进一步国际专门化的空间非常有限 (Hoekman, 2015 ; Constantinescu, Mattoo and Ruta, 2016)。这里的“分散化”是指将生产分解为多个阶段的过程，各个阶段在不同的工厂或企业进行，而且可能位于不同的国家。

数据支持第一种假设。国内出口增加值变化经常被用来解释分散化。分散程度越高，通常对中间产品的进口就越多，而国内增加值就越少。在2011年之前，中国的国内增加值显著减少——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一势头被短期打断——这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大力参与是一致的。但从2011年起，中国的国内增加值稳步上升。

这种趋势可以解释衡量贸易增长的两个原因。其一，由于贸易是按照总额而非增加值进行衡量，因此如果分散程度和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更高，就意味着贸易量更大，因为对于跨境活动是重复计算的。因此，分散程度和全球价值链交易的下降都会转化为贸易总额减少。其二，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占有很大份额 (见图1)。只有韩国与中国呈现相同趋势——2011年之后国内增加值上升。对于所有其他国家而言，国内增加值要么维持不变，要么略有下降，这与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整合是一致的。但中国在出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其对总体趋势有很大影响。

第二个假设——分散化已经走向正规——的证据有多种说法 (Gaulier, Sztulman and Ünal, 2019)。文章中使用生产分散化的一个理由就是中间产品的贸易。中间产品是半成品与所谓部件和组件的统称。图2列示了1990—2017年中间产品的出口情况 (绿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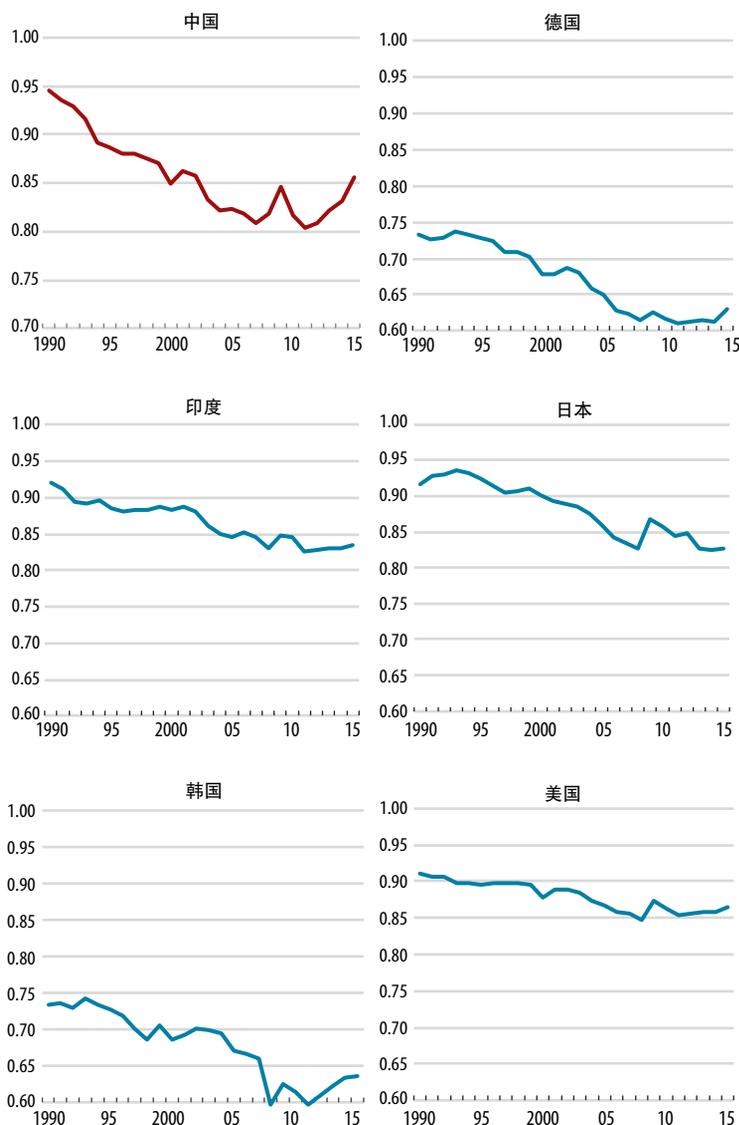
中间产品的出口在2013年之前呈现强劲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被短暂打断，但在2013—2016年期间稳定下降。这一指标以出口价值为基础，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商品价格。图2还列示了与全球价值链商品贸易的联系更为密切的分散化替代指标；制造业贸易中部件和组件贸易量的占比 (红线)。这一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

图1

中国与全球比较

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占有很大份额。在可比经济体中，只有韩国与中国呈现相同趋势——自2011年以来国内增加值大幅增加。

(国内增加值, 占出口总额的份额)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 (TiVA) 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

注：国内增加值的趋势为选定国家出口金额的比例。

以来稳步增长，自全球危机以来也并未显示出任何反转迹象。而且，正如 Gaulier、Sztulman 和 Ünal (2019) 所说，这种趋势并非行业构成效应产生的结果。电子行业是全球分散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部件和组件贸易的占比为 40%。在该行业，发展趋势呈现出鲜明对比。虽然部件和组件贸易相对于办公机器与计算机贸易总额的占比

在下降，但电信设备的占比在上升。最后，全球价值链的产品和地区覆盖仍然在扩展；如果按照产品 - 地区组合的数量来衡量（扣除新产品），部件和组件贸易的地域覆盖与产品的多元化程度提高 (Gaulier, Sztulman and Ünal, 2019)。

在与分散化最为相关的部件贸易，贸易增长并未呈现明显放缓迹象。沿着同样的思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将导致国内制造增加和未来贸易减少的观点并无实证支持。如果说有，倒是也有证据表明这方面的进步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导致贸易增加。如果技术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政策在塑造未来的过程中可起到关键作用。但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崇也在减退。表象之一是，2018 年新签订的区域贸易协议数量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线希望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由于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程度加深，肯定会营造出更容易接纳保护主义的环境，如果说没有主动要求实行保护主义的话。而且，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所起作用的长期不满导致要求改革甚至瓦解现有贸易体制。有人抱怨，并非所有人都按照规则办事，而且现有贸易体制并非“公平”。有很多人对政府补贴、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汇率操纵表示关切。不过，这种不满可能会导致未来开展建设性改革和设计出更好的贸易体制，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造成不满意的一个原因与规则的流程与解释有关。对于现有争议解决机制、补贴纪律的覆盖范围以及国有企业的适当处理，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且世界贸易组织 (WTO) 传统的孤注一掷的模式 (所有 WTO 成员必须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 已经成为一种自我束缚。肯尼迪回合谈判花费了四年时间，而多哈回合自 2001 年开始就几乎被视为已经死亡。讽刺的是，WTO 吸收了几乎全球

覆盖的国家为其成员，但 WTO 的成功却构成了其自身的最大挑战，因为所有成员要达成共识越来越难。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认识到这种挑战会推动更为灵活的模式，比如有类似想法的国家达成诸边协议 (IMF-WB-WTO, 2018)。在诸边协议中，全体 WTO 成员必须参与，而诸边协议仅涉及部分国家，允许成员自行选择采用新规则。WTO 仍然倾向于多边协议。但如果多边协议不可行，诸边协议可作为次优选项。与双边或区域协议相比，诸边协议的优势在于，如其他 WTO 成员之后决定加入，原则上是可以加入的。因此，诸边协议克服了完整多边协议具有的潜在惯性，而不损及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进展，其中就包括信息技术协议，该协议最初于 1996 签署，于 2016 年得以扩大，有 53 个国家同意削减关税，而且适用于全体 WTO 成员。作为一种选择，WTO 通过订立多边协议，将特定问题与更为广泛的方案解除捆绑，从而尽量提高灵活性。旨在改进海关规范的 2013 年贸易便利化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项协议的实施体现了 WTO 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另一个不满意的原因与国际协商和新协议的侧重点是否适当有关。数字化创新改变了贸易的性质。现在许多企业的运营职能是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一环，联接多个国家；很多服务，比如银行和保险，现在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企业获得；电商在跨境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些领域的增长需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同时，这也要求解决妨碍跨境贸易的“边境之内”的问题 (Mattoo, 2019)，包括国内法规的协调、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以及就如何处理数据与敏感隐私问题达成共识。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即使是在之前已经成功实现商品市场自由化的国家。不同国家法规的差异反映出对质量标准、国际市场力量的运用以及数据隐私的合理关切。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合法利用国内法规保护消费者与滥用保护主义之间达成平衡。仅仅通过贸易政策无法推动这

图2

形势不明

对于制造业的全球化是否已告结束或者正在进行之中，组件和其他中间产品的出口给出的答案表明无法一概而论。

(指数; 2010=100)



资料来源: 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注: 本图反映下列变量: 部件和组件的出口、其他中间产品的出口、中间产品 (部件和组件及其他) 的出口, 1990—2017年。

些领域的进步，还需要监管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展望未来，促进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增长所需的合作形式如果涉及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有相同目标的经济体，就更有可能变成现实。在此背景之下，区域贸易协议可作为出发点和多边平台的有益补充。国际贸易注定不会长期放缓，但目前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国际贸易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做出的政策抉择。FD

佩妮洛皮·寇吉亚诺·哥德堡 (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 是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Constantinescu, Cristina, Aaditya Mattoo, and Michele Ruta. 2016. "Does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Matte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673, Washington, DC.

Gaulier, Guillaume, Aude Sztulman, and Deniz Ünal. 2019.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Receding? The Jury Is Still Out. Key Findings from the Analysis of Deflated World Trade in Parts and Components." CEPII Working Paper 2019-01, Paris.

Hoekman, Bernard, ed. 2015.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MF-WB-WTO). 2018. "Reinvigorating Trade and Inclusive Growth." Washington, DC.

Mattoo, Aaditya. 2019. "Services Globalization in an Age of Insecurity: Rethinking Trade Cooperat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579, Washington, DC.